

木俑无言 楚韵有声：

多学科协作共解武王墩木俑之谜

温小宁 张治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遇见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自开展以来，观者如潮，广受好评。相较于形体硕大的青铜饕餮、艳丽飘逸的彩绘龙凤漆案，展厅内静默伫立的十余件木俑，色泽暗沉、纹饰斑驳，显得朴素无华。借助传统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以及木材考古、纺织考古、文物保护等多学科研究，学者们正逐步唤醒那段尘封已久的楚韵风华。

考古新证：从人殉到俑葬的历史转型

殷商时期，人殉之风盛行。春秋以降，随着社会进步与人本思想的发展，以俑代人的丧葬形式开始流行。在这场深刻变革中，楚地木俑独具特色。

武王墩一号墓是迄今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王墓，出土木俑约300件，几近此前发现的东周木俑总数之半，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楚俑制度的认识。楚俑随葬始见于春秋战国之际或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逐渐增多，于战国晚期达到鼎盛。尽管俑葬已蔚然成风，但人殉现象却并未绝迹。考古发现表明，战国早期的高等级楚墓，如熊家冢墓区已见百余座殉葬墓；战国中期的新蔡葛陵楚墓则有7名人殉；直至战国中晚期，仍有一些楚墓保留多人殉葬的现象。武王墩一号墓以规模庞大的木俑群取代人殉，表明人道化的丧葬理念在楚国末世趋于成熟。

该墓葬室呈“亞”字形，木俑集中出土于西Ⅰ室和西Ⅱ室，同时伴有剑、矛、漆木车模型等。木俑形态丰富，目前已辨识出立姿屈膝着裙俑、跪姿连档抚琴俑、立姿连档俑、立姿分档俑等不同类型，大致可归为乐舞与护卫两类。前者靠近墓主室，后者则居于外侧。它们姿态有别、持物各异，共同组成了一个微缩而完整的服务体系，生动呈现了战国晚期楚国贵族的生活与礼仪场景。

与早期出土的零星木俑不同，这批木俑群呈现出鲜明的系统化、场景化特征。作为楚俑发展的集大成者，武王墩一号墓木俑既是对先秦俑葬传统的总结，也为后世汉俑的繁荣奠定了直接基础。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木俑，以及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北齐山西西陵楚王墓的陶俑，乃至陕西汉景帝阳陵陶俑中，皆可见其遗风流变，彰显出楚文化对中国丧葬艺术的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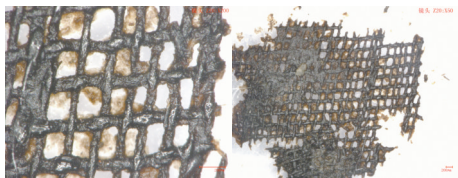
微末见精：科技手段细探楚俑华彩

细观这些木俑，其制作手法与装饰风格，无不烙印着楚文化的独特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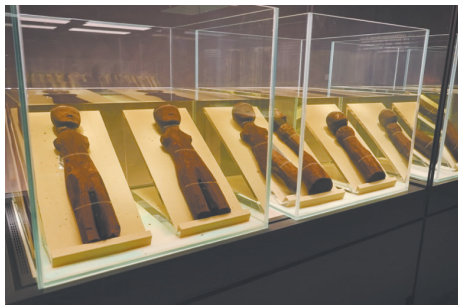
与北方地区流行的陶俑不同，楚俑以木为主。木材考古学的初步鉴定表明，武王墩一号墓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木俑身



木俑纺织品残片显微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木俑

木俑多用梓木。此乃楚地代表性物产，《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即有“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的记载。梓木材质优良，纹理通直，不易翘裂，适于雕刻，且耐湿耐腐，利于在地下环境中长久保存。《本草纲目》称“梓为百木长，故呼梓为木王”，视为木中上品。这种木材不仅大量用于营建武王墩墓的宏阔椁室，也是楚地高等级墓葬棺槨的常见选材，成为身份与地位的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梓树更被赋予深厚意涵。《诗·小雅·小弁》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一木一叶皆系乡愁。清华简《程简》篇中“梓”（梓）更承载着天命转移、吉祥美好的神圣寓意，象征着周将代商的吉兆。古书中屡见“梓棺”“梓器”等称谓，指以梓木制作的丧葬用具。千百年来，这些不朽木人守护于考烈王身侧，寄寓着楚人与君王伴、魂归所安的深情祈愿。

在制作工艺上，这批木俑采用分制榫接技术，头、躯干等分别雕琢，再用竹钉组装连接。木俑多无手臂，以木竹签代之。部分木俑两腿分立，配有双足。在楚国匠人的精心设计与研刻下，这种工艺不仅大幅提高了批量制作的效率与原料利用率，更使俑身姿态突破

原木形态的束缚，栩栩如生。

木俑的装饰，极尽楚风之妙。面部五官以墨线勾勒眉目，嘴唇点染朱砂，虽经千年沉埋，残色犹存。不少木俑原本身着服饰，大多已腐朽不存。文物保护工作者采用超景深显微镜、扫描电镜、红外光谱等科技手段对遗存残片进行检测，使织物的纤维材质、组织结构及织造工艺得以清晰展现。西Ⅰ室发现的漆纱残片，疑似为木俑冠帽上的残留物。漆纱是在织物表面髹饰大漆制成的复合材料，质地坚硬，便于成型，工艺殊为复杂。楚国流行佩戴高冠，如《楚辞》所咏“冠切云之崔嵬”“高余冠之岌岌兮”，漆纱的特性正适于制作此冠。一丝一缕，雕绘并重，楚人“华采衣兮若英”的浪漫，就此凝固于这些木俑之上。

多重互证：文献与实物再现王宫盛景

更为难得的是，西室内还同时出土了少量形制完整的遣策竹简，即记录随葬品的清单。历经两千余年的埋藏，上面的文字已非肉眼能辨识。文物保护工作者借助高清红外扫描、连二亚硫酸钠脱色等技术，使得字迹清晰可辨。

初步释读显示，遣策中木俑所着的服饰有“玄幄(服)”“黼冠”等名目。玄幄为传统黑色礼仪之服，庄重肃穆。“黼冠”即“黼冠”，前低后高，其形象见于包山楚墓出土的人物车马纹，楚简上也有相关记载。此冠为楚人典型首服，流行多时。《淮南子·主术》载“楚文王好服黼冠，楚国效之”；《左传》称之为“南冠”，与中原冠式迥然有别，一望便知。结合木俑整体造型来看，服饰形制多样。分档俑的衣装应为上衣下裳制，上衣及膝，下身着袴；而多数木俑体态修长、下摆外扩，仍可窥见楚式深衣之轮廓。深衣者，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是东周时期中原贵族通行的服式。《礼记》对其形制、色彩、尺寸皆有严格规制。楚人在中原服饰礼仪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融汇与创新，渐成独具一格的“楚服”（《战国策》）；楚之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苦创业；至西汉大一统，开国将臣多出于楚地，楚服风韵遂流布天下，为中华衣冠体系增添了绚烂的一笔。

遣策中还详细记录了木俑的数量、身份及所持器物。歌者、舞者、击鼓者各司其职；除楚地本土艺人外，亦有来自吴、郑之人，这与《楚辞·招魂》《大招》所描绘的四方乐舞汇聚之景相呼应。所载笙、竽等乐器，可与同墓出土的实物相互印证。楚国男子素有佩剑之风，西室出土约130件配套的木剑模型，正是“带长铗之陆离兮”的实物写照。多重证据相互交织，长袖缦卷、吹笙鼓瑟的乐舞盛况跃然眼前，持戈握剑、阵列森然的护卫之势扑面而来，使人仿佛置身于两千多年前楚国王宫的恢宏场景之中。

在展厅外设置的观众意见簿上，一则留言写道：“这次展览只有立俑，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多姿态的木俑。”公众的期待，与研究者们努力同向而行。多学科协作理念一直贯穿于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价值阐释的全过程。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考烈王的世界将更加完整地呈现于世人面前，而静默的木俑们，也将继续讲述那些鲜活的楚国故事。

(作者单位：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汉代画像石著录与研究中的线描小叙

杨爱国

近年来，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与品质的提升，在汉代画像石著录与研究中，原石照片，尤其是高清图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杂志社和出版社多有采用。与此同时，传统的拓片与线描图并没有被冷落，尤其是线描图，仍然是汉代画像石著录与研究的重要手段。不仅常被人们使用，还有人专门就汉代画像石图像的线描进行学术研究，以期提升汉代画像石线描图的水平与质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代画像石著录与研究中线描发展演变的历程进行总结，对提升线描在汉代画像石著录与研究中的应用的水平是有益的。

金石学时代对汉代画像石的摹刻

位于山东嘉祥坊坊镇武宅山下的武氏墓群石刻最早著录于北宋末年赵明诚(1081—1129)的《金石录》，由著录文字可知，赵明诚夫妇收藏的是武梁祠画像拓片，并未对画像进行描摹。最早对汉代画像石进行描摹的是南宋金石学家洪适(1117—1184)，他在《隶续》一书中摹录了《柳敏碑》背面画像、《益州太守无碑》画像、《汉故不其令董君阙》画像、《武梁殿》画像等，其中的《武梁殿》画像就是现存嘉祥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的武梁祠画像。清代金石学家冯云鹏(1765—1839)、冯云鹤(生卒年不详)的《金石索》中的《石索》也对武氏祠画像进行了摹刻。

不论是南宋洪适的《隶续》，还是清代冯云鹏、冯云鹤的《金石索》中的《石索》，他们对画像石图像的摹刻是石板印刷，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线描并不是一回事。虽然今天对汉代画像石的线描主要也是用来印刷与传播，但前者只求表意，不求精准与全面；后者则要求最大限度地精准、全面表现原画像的信息。

近现代对汉代画像石的描摹

我们所说的汉代画像石线描图是近代由海外传来的。笔者所知较早的线描图是1931年德国学者奥托·费舍尔(Otto Fisher)在《汉代绘画艺术》一书刊布了一组“朱鲋石室”的线描图，继其之后，美国艺术史专家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在1941年发表的《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一文(王世襄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5年第七卷第二期)，除了绘制了她复原的武梁祠、前石室、左右室结构图外，还线描了武梁祠、后石室、前石室、左右室和其他

散画像。在复原山东金乡朱鲋石室时，对石室墙壁上的画像也画了线描图。

中国学者较早对汉代画像石进行线描，是1956年出版的《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报告中，曾昭瓘团队详细绘制了该墓结构图，包括局部结构图，对不甚清晰的中室立柱画像，后室藻井进行了线描，报告图版最后还附有墓中车和建筑画像的线描图。此后的汉代画像石报告，如《密云打虎亭汉墓》《朱鲋石室》《孝堂山石祠》《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等也都使用了线描图，且使用的比例较《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有很大提升。

数十年来，在汉代画像石研究中，有学者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自己亲手线描汉代画像石上的图像，如邢义田、郑岩等在研究汉代画像石图像时，对自己研究的对象，在采用原石照片和拓片的同时，都用到了自己对画像的线描图。由于是为研究所用的线描，作者在描摹画像的同时，会在线描图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标识，如邢义田在研究格套、榜题、文献与图像的关系时，对所用“七女为父报仇图”中的七女不仅线描，还涂成浅灰色，以便识别。这是研究性线描与记录性线描的一个明显区别。

对汉代画像石图像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线描实践，同时进行理论探讨的，是北京朱青生教授团队。他们在21世纪初正式启动《汉画总录》编撰项目时，就把线描作为记录方式之一列入其中。20多年来，他们就如何做汉代画像线描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与讨论，在最初请考古绘图专家线描陕西榆林汉代画像石之后，近年来与天津美术学院姜彦博士为首的TTLP线描小组合作，为《汉画总录》描图。针对画像石，他们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以高清图摄影照片为基础，辅

助考古报告、研究文献、石刻拓片等参考资料，使用Adobe Illustrator与数位板配合，以直描法绘图。与此同时，传统的手绘方式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以延续其尚无法完全被新技术取代的独特价值。朱青生教授还提出了“科学线描”的概念，以期用线描的方式更加准确、全面地记录汉代画像石的图像信息。

山东博物馆于秋伟和朱华团队于2011年至2014年对山东沂南北寨村东汉墓画像进行了全面线描，并于2015年出版了《沂南北寨汉画像》一书，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并获得较高评价。受此鼓舞，他们又于2019年整理出版了《费县刘家疃汉画像石墓》，对该墓画像石同样采用了线描记录的形式。在前两书的基础上，2025年出版了《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画像》，发表了武氏祠和附近的朱山祠堂的线描图，且与原石、拓片相互对照。于秋伟和朱华团队对汉代画像石的线描，既没有采用软件生成线描图后人工修改，也不是在原石或拓片照片的电子板上描摹，而是采用传统的纯手工描摹的方法，即把硫酸纸覆盖在拓片上，用描图笔手工一比一描摹，与传统的考古器物描图方法相同。为了减少因拓片质量问题对线描的干扰，在线描过程中，他们反复对照原石和高清图原照片，确认线条多少与位置，最大限度地保证线描的准确性，由此也形成了自己对汉代画像石图像线描的风格。

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发达、普及的今天，传统手工线描与电脑软件线描共存，各展其长，以推动汉代画像石，乃至其他文物的线描向着更精准、更美观的方向发展。我们也期待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升，更有力地提高线描效率和精准度，更好地服务于文物的保护与研究。

(作者单位：山东博物馆)



洪适《隶续》摹刻武梁祠西壁画像局部



嘉祥武梁祠西壁画像线描图

更路簿是木帆船时代海南渔民在长期南海航行与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形成的民间航海指南。这一航海知识体系以口传心授和手抄本记录形式在渔民群体中代代相承，系统记载了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航线方位、更数、岛礁地名及水文地貌等航海信息，是海南渔民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华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从琼海市潭门镇上教村老船长卢家炳家征集到1册更路簿抄本。该抄本从“家族秘藏”转为“国家收藏”，是南海文物征集与保护的重要成果，其内容丰富、航线清晰，保存状况相对完好，兼具重要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法理价值，为研究我国古代航海技术、南海海洋文化及海疆开发史提供了珍贵的民间原始资料。

形制特征

该抄本为绵纸线装，1册，纵约23.5厘米，横约14厘米，计34页(含封面、封底)。封面无字，前20页为更路(航路)正文，余为空白页。装帧采用传统民间古籍通行之线装工艺，除封面、封底为单张纸外，内页均以绵纸对折成册，书脊以棉线穿订固定。所用纸张为海南本地坡棉纸，质地坚韧、耐折耐磨，吸墨性较好，能较好地适应潮湿的海上使用环境。

抄本以毛笔小楷墨书，遵循传统竖行书写制式。字迹工整而略带潦草，尽显民间手抄文献的质朴本色。用字则繁体、异体与俗字兼用，并存少量通假字、讹字，如“门”与“門”、“头”与“頭”混用，“使”通“驶”、“登”通“灯”等。从笔迹特征判断，抄本内容应系同一人书写。正文以极简练的条目式辑录更路，每条更路上端施朱笔红圈以界分界，便于快速查阅辨识。正文各项中部钤有红色方形印章，印文漫漶不清，推测为卢氏家族或抄录者私章。

抄本呈现明显使用痕迹，纸张呈浅黄褐色至深褐色，色泽分布不均，部分区域因水渍浸染、虫蛀痕迹等影响，颜色明显加深。书角、书口及装订线处磨损、卷曲与撕裂严重，尤以左下角与书脊为甚。破损处可见明显的粗纤维束，系手工棉纸的典型特征之一。墨迹边缘存在自然渗化痕迹，这些特征与长期随船携带、频繁翻阅的使用背景高度契合。

抄本年代

与抄本一并征集的卢氏家谱记载，卢氏家族至少从乾隆年间起，便定居于今琼海滨海一带，以渔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据卢家炳口述，该抄本系其父卢业发(1927—2017)及其祖辈世代沿用之物，其家族对该抄本的使用可能追溯至高祖卢有寔(1826—1894)时期。基于此，夏代云等研究者推断该抄本年代应为清道光年间。

结合抄本文本特征与物质形态综合分析，可对其年代作出更为精准的界定。抄本出现的“星洲”称谓，是极具价值的断代标尺——“星洲”作为新加坡的雅称，最早见于19世纪末清光绪年间，此后逐渐在华侨社群及我国侨乡民间流行，清道光年间尚无此称谓，据此可明确抄本年代上限不早于清光绪时期。此外，抄本中“(此处是北海)”所使用的圆括号，作为西式标点的一种，于清末随西学译介传入中国，民国初年轻白话文运动倡导逐步在书写中普及，进一步佐证了抄本抄写年代不会早于清末。结合抄本纸张老化程度、装帧形式和书写风格等特征综合判断，该抄本抄成年代为清末至民国初年，系卢家炳祖父卢鸿保(1890—1967)任船长时抄写而成，其生卒年代与该断代结论高度契合，印证了这一判断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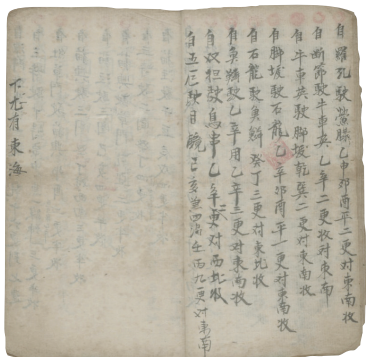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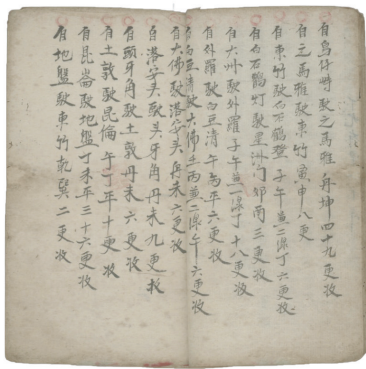
航路体系

海南渔民在开发利用南海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海域与岛礁命名体系。在岛礁命名上，往往根据岛礁的特征命名，如以地貌、气候、水文、生物、海产、位置、数字、顺序、大小、颜色、传说、岩性、吉祥等命名。在海域命名上，将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统称为“东海”，将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统称为“北海”。该抄本依此海域认知、航行范围范围划分为三篇，各篇章头分别有“此处是北海”“下尤有东海”“下尤有星洲洋”语，可分别称为“北海更路”“东海更路”“星洲洋更路”。“北海更路”篇辑录南沙更路84条，“东海更路”篇辑录西沙更路38条，“星洲洋更路”篇辑录海外更路13条，各篇划分界限分明，编排规整有序。抄本所载更路每条均独占一竖行，独立成条且核心信息要素完整。在排布上，部分存在先后航行关联的更路又可上下衔接、次第排列，既保证了单条更路的独立性，又兼顾了航线编排的连续性。全册更路均采用程式化、极简练的条目句式，以高度凝练的文字承载航行起点和讫点、罗盘方位、航程更数等导航信息。这种兼具规范性与实用性的文本编排方式，展现出海南渔民对航海经验条理化、体系化的整理思路，充分体现出抄本内容严谨的系统性与逻辑性，是民间实用航海文献体例走向成熟规范的重要体现。

抄本中三篇更路在句式结构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北海更路”篇更路的基本格式为“自(起点)+驶/使+(讫点)+(方位)+(更数)+对(方位)收”，各条更路多以“对(方位)收”收尾，例如：“自黄山(太平岛)驶南堂(鸿麻岛)壬子一更对东南收”。“东海更路”“星洲洋更路”两篇更路的基本格式则为“自(起点)+驶/使+(讫点)+(方位)+(更数)+收”，少见“对(方位)收”这类表述，例如：“自猫注(永兴岛)驶三圈(浪花礁)己亥四更半收”。这种篇章间的差异，或系抄

舟子秘本：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征集入藏的卢家炳家传更路簿抄本探析

李东风



卢家炳家传更路簿抄本

本所据底本来源不同、形成年代各异所致。更路簿极少由一人一次性原创而成，多是航海家族在世代航海实践中，陆续收集、抄录、整合不同来源、不同时期、不同海域的更路资料，经世代增补、逐步汇编而成。

“北海更路”篇的84条更路，除2条为西沙至南沙的跨海区联通航线，分别是第1条从三圈(西沙群岛华光礁)驶往罗I(南沙群岛马欢岛)和第2条从白鸟仔(西沙群岛盘石屿)驶往双屿(南沙群岛北子岛和南子岛)，其余82条更路均为南沙各岛礁之间的航线。这一密集的航路网络覆盖了南沙群岛核心区、涉及铁屿(中业岛)、黄山马(太平岛)、断节(仁爱礁)等近70处岛礁，航路形态呈蜘蛛网状、放射式布局，反映海南渔民对南沙群岛地理空间的精确掌握。

“东海更路”篇的38条更路，除7条为海南岛东部往返西沙群岛的航线，分别是第1条从潭门(潭门港)往七连(七连屿)、第19条从潭门(中建岛)驶回港，第22条从大洲(大洲岛)驶干豆(北礁)，第23条从高龙头驶干豆(北礁)，第24条从铁炉礁(铁炉礁)驶干豆(北礁)，第25条从高龙头驶下峙(永乐群岛)，第28条从干豆(北礁)驶回港，其余更路均为西沙群岛各岛礁之间的航线。涉及干豆(北礁)、猫注(永兴岛)、大圈(华光礁)、半路(中建岛)等20多个岛礁，形成覆盖西沙主要岛礁的航路网络。

“星洲洋更路”篇的13条更路，以首尾相连的体例排布，实则构成两条通往新加坡的航线。第一条航线以南沙群岛为起点，从鸟仔峙(南威岛)出发，经之马雅(杰马贾岛)、东竹(奥尔岛)、白石鹤登(新加坡白礁)，最终抵达星洲门(新加坡港)。这条航线展现了海南渔民以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作为渔业生产与海上贸易重要基地的历史事实。第二条航线则是从海南岛东部的大州(大洲岛)出发，途经越南中部海域的外罗(惹岛)、白豆潜(归仁湾附近)、大佛(华列拉押)、落安头(嘎那角)、头牙角(格嘎角)、土敦(头顿)、昆仑(昆仑岛)、马来半岛附近海域的地盘(礁门岛)、东竹(奥尔岛)，与第一条航线汇合，抵达星洲门。值得注意的是，本篇更路所载的诸多地名，如大州、外罗、大佛、昆仑、地盘、东竹等，与《郑和航海图》《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海道针经记载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望山、港口和中转站高度契合，显示出更路簿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联系。

价值意义

该抄本是海南民间更路簿的典型实物标本，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以卢家炳家传更路簿抄本为代表的南海更路簿，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海洋文化遗产。加强对更路簿的抢救性保护、系统性收集、深入性研究、合理化利用和传承性开发，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海洋文化、培育国民海洋意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本文系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课题重点委托项目2025HNMGCWT03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版责编：何薇 甘婷婷 王龙霄